

中国古代文学在欧洲

ZHONGGUO GUDAI
WENXUE ZAI OUZHOU

徐志啸 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文学在欧洲

ZHONGGUO GUDAI
WENXUE ZAI OUZHOU

徐志啸 主编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古代文学在欧洲 / 徐志啸主编. — 石家庄 :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545-0429-1

I. ①中…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
文化传播—欧洲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5451号

书 名 中国古代文学在欧洲

主 编 徐志啸

撰 写 者 陈建华 李明滨 詹春花 田晋芳 刘琳娟

策 划 张晨光 王书华 高树海

责任编辑 姬璐璐 杨 乐

封面设计 郝 旭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 050061)

印 制 唐山市润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9.2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45-0429-1

定 价 48.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从学问的角度说，中国古代文学无疑是高峰、是海洋，攀登这座高峰，深潜这个海洋，需要开拓的眼光、深厚的学术研究能力、扎实的理论功底、广博的知识积累，需要每个投身其中的学者耗费极大的心血和精力。因为它所包含的思想内涵、所展现的各种形式，以及千百年来历代文学之间的传承联系和演变，实在是有着无数的宝藏可待发掘，有着大量的艺术精华可待汲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中国古代文学，可以挖掘的余地还很大，还远没到有些学者所担忧的产生危机和难以深入开掘的地步。但是，我们的眼光，确实不能仅仅停留于眼前的现状，满足于已有的成果和局面，应该从拓宽和加深的角度，考虑这个学科继续发展的问题，这也是时代对我们提出的课题——21 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激发它潜在的无穷生命力，从而迈向更深入更广阔的天地，这促使我们必须做深层次的思考。与此同时，将学术视野拓宽，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从多层面、多视角的角度考虑问题，自然使我们想到了中国古代文学在海外的传播、影响与接受，以及中国本土之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这一课题。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文学确实传播到了中国本土以外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影响波及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地区）和民族的文学。考察这些国家（地区）和民族是如何接收、传播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很好的角度和课题，因为这将为我们打开多扇窗户，让我们透过这些窗户，看到许多新鲜的东西，知道别人是如何看待中国古代文

学的，他们的看法与我们有何不同。这便有了属于以宏观视野透视中国古代文学、将中国古代文学置于世界范围作鸟瞰与观察、从中剖析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国以外国家和地区关于传播与接受状况、概貌和特点的研究。

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首先，从历史的角度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往来与文化交流，早在汉代乃至之前就已开始。这种交往与文化交流，不只是外来文化与文学输入中国本土，使中国文化与文学发生了变化，比如汉唐之际的佛教输入等，其实还应包括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对外输出。这种输出，对输入国家和地区同样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使得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与文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无论是文学的表现形式还是内涵，有些甚至还是本质上的影响。当然，从时间上说，这样的输出，相对输入来说总体上可能要晚一些。另一方面，这种输出本身，无疑扩大了中国文化与文学在世界范围的传播与影响，实际上对中国文化与文学自身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对此，历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似乎还重视不够，比较文学研究界虽在这方面已予关注，并有相关成果问世，但系统全面地梳理，进行有深度的思考和理性阐释，似乎也还不多见。

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在域外的传播与接受，同时也是对中国古代文学做跨越国度、民族与文化的比较研究，这种比较研究有利于我们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本质特征，以及与他国文学在艺术表现形式乃至文学内涵上的种种联系和异同。通过这些比较，我们不光能更清楚地认识中国古代文学本身的内在特质——这是指那些不通过比较所难以认识到的特征，更能从宏观高度认识文学在跨越国度后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影响所带来的具有共通性的客观规律。

本书重点在于考察中国古代文学在欧洲地区的传播、影响与接受，即全书以欧洲地区为范例，重点选取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俄苏、英国、法国、德国，通过大量实际的史料和案例，说明中国古代文学在这些国家的传播、影响与接受，从中一窥中外文学的交流、碰撞与融合。这对于我们开拓文学研究的视野，增加文学研究的信息量，了解欧洲地区的国家和人民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的态度与看法等，均甚有裨益。

目 录

俄国篇 中国古代文学在俄苏的传播与接受 / 1

第一章 早期的中俄文学交流 / 3

- 一 18 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 3
- 二 俄国早期汉学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译介 / 7

第二章 中国古代文学在 19 世纪的俄国 / 12

- 一 俄国汉学的进步 / 12
- 二 中国古代文学译介的增加和研究的深化 / 15
- 三 托尔斯泰与中国先秦诸子学说 / 20

第三章 中国古代文学在 20 世纪的俄苏 / 27

- 一 俄苏对先秦文学至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接受 / 27
- 二 俄苏对唐代文学至明代文学的接受 / 35
- 三 俄苏对清代文学的接受 / 45

第四章 俄苏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名家举要 / 51

- 一 阿列克谢耶夫与《诗品》研究 / 53
- 二 费德林与《诗经》研究 / 57
- 三 李福清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 / 61

英国篇 中国古代文学在英国的传播与接受 / 67

第一章 17 世纪至 18 世纪的英国与中国古代文学 / 69

- 一 概述 / 69
- 二 中国题材的历史剧在 17 世纪、18 世纪的英国 / 71
- 三 中国古代文学在 18 世纪英国的翻译与研究 / 77

第二章 19 世纪中叶后的英国与中国古代文学 / 84

- 一 概述 / 84
- 二 理雅各等对中国古代文学典籍的翻译 / 88
- 三 翟理思《中国文学史》的整体认识 / 93

第三章 英国 20 世纪至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 101

- 一 概述 / 101
- 二 对中国古代诗歌及诗人的译介 / 104
- 三 对中国古代小说的译介与研究 / 114
- 四 对中国古代戏剧的译介及研讨 / 132

结 语 / 142

法国篇 中国古代文学在法国的传播与接受 / 147

第一章 欧洲与中国的初会 / 151

- 一 早期传教士汉学的时代烙印 / 151
- 二 16 世纪、17 世纪传教士带回法国的中国典籍和专著的影响 / 154

第二章 18 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引入法国 / 159

- 一 法国兴起“中国热” / 159
- 二 中国古典诗歌译介起步 / 161
- 三 儒家经典的全面译介 / 165

四 中国悲剧《赵氏孤儿》 / 166

五 中国古典小说译介起步及影响 / 170

第三章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进一步引入 / 173

一 拓展标志：汉学发展为专门性学科 / 173

二 中国古典诗歌的大量引进及其影响 / 175

三 戏剧和俗文学引进范围拓宽 / 185

第四章 20 世纪蓬勃发展的中国古典文学译介 / 192

一 20 世纪法国汉学的走向 / 192

二 中国古典诗歌研究进一步深入 / 194

三 中国古典戏剧、小说及其他文类的大量翻译研究 / 198

四 中国古典文学对 20 世纪法国作家的影响 / 202

结 语 / 208

德国篇 德语翻译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 / 215

第一章 概述 / 217

一 起源、传播特点 / 217

二 汉学西播的杰出使者卫礼贤 / 219

三 一雅一俗德国汉学双璧 / 220

第二章 早期接受：19 世纪被译介的中国古代文学 / 224

一 诗歌 / 224

二 小说 / 225

三 戏剧 / 227

第三章 对中国古代文学的整体性译介 / 229

一 中国诗歌、选集的丰富翻译 / 230

- 二 中国诗学作品的译介 / 235
- 三 关于中国诗学研究举隅 / 236

第四章 《诗经》、“楚辞”翻译 / 239

- 一 百译不厌是《诗经》 / 239
- 二 知难而进译“楚辞” / 245

第五章 魏晋文采亦风流 / 248

第六章 李白及唐宋诗词 / 251

- 一 李白诗及其他唐诗德译 / 251
- 二 德译李煜及两宋诗词 / 258

第七章 再续舞台艺术前缘 / 261

- 一 《灰阑记》《赵氏孤儿》的继续改编 / 261
- 二 关汉卿、王实甫作品等 / 262

第八章 中国近代叙事文学大展播 / 266

- 一 海外奇观《今古奇观》德译 / 266
- 二 古典长篇名著显魅力 / 272
- 三 德译明代戏剧及诗文 / 277

第九章 中国文学德译高峰 / 279

- 一 《红楼梦》等长篇小说的翻译 / 279
- 二 “聊斋”等清代短篇小说的丰富翻译 / 288
- 三 清至近代戏剧、皮影戏、弹词等的翻译 / 292
- 四 童话及民间文学的翻译 / 294

结 语 / 297

后 记 / 300

俄国篇

中国古代文学在俄苏的传播与接受

第一章

早期的中俄文学交流

中俄之间的文学交流在 18 世纪开始有了实质性的起步，这是因为 17 世纪至 18 世纪盛行于西欧的“中国热”很快席卷了俄国，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和古代哲学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传入俄国。

一 18 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

18 世纪时中俄作为接壤的邻国，人员和物资往来频繁，而俄国人写的中国见闻和旅行记之类的文字^①，也引起了 18 世纪的俄国作家们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在那个时代的俄国作家心目中，特别是那些受到启蒙思想影响的作家的心目中，中国是一个政府清廉、文化厚重的理想王国，一个可以与俄国丑恶现实相对照的道德的和哲人的国度。

1770 年 2 月，俄国作家诺维科夫在他创办的《雄蜂》第 8 期上刊登《中国哲学家程子给皇帝的劝告》一文。“程子”指的是宋代哲学家程颐。文章的原题是《为太中上皇帝应诏书》，写于 1065 年，系程颐为其父起草的给宋英宗的奏折。俄译文取的是该文的后半部分，由列昂季耶夫译出。

①一些到过中国的俄国外交家、旅行家和商人等将自己的见闻变成了文字，如季姆科夫斯基的三卷本《中国旅行记》等。18 世纪俄国出版的有关中国的著述多达百余种，有的刊物以相当多的篇幅介绍中国情况。

原文主要谈的是治国的方针和理想君主应该具备的条件，即“一曰立志，二曰责任，三曰求贤”，“所谓立志者，至诚一心以道自任，以圣人之训为可必信，先王之治为可必行，不狃滞于近视，不迁惑于众口”，“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或欲为而不知所措，或始锐而不克其终，或安于积久之弊而不能改为，或惑于众多之论而莫知适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刊登此文，表面上是赞扬中国古代哲学家关于“君志立而天下治”的思想，实质上却在讽刺俄国现实，特别是女皇“开明政治”的许诺“始锐而不克其终”。^①诺维科夫还在译文的后面加上了这样一段似褒实贬的文字：由于女皇的“不朽业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假如这位中国哲学家活到现在的话，他就不必写这篇劝告给皇上，他只要劝告皇帝步叶卡捷琳娜大帝的后尘就可以进入永恒之宫了”。^②此文发表，《雄蜂》停刊。

同年7月，诺维科夫又创办了刊物《空谈家》。这份刊物的第2期上刊登了《中国汗雍正皇帝给儿子的遗嘱》一文。此文原为《雍正遗诏》，系1735年清朝皇帝雍正写给弘历等的遗嘱，载《大清世宗宪实录》，由列昂季耶夫译出。文章的内容是雍正对他的继承者该如何治理国家的告诫，主要涉及勤政为民和惩恶扬善的一些原则，诸如“勤求治理，抚育蒸黎，无一事不竭其周详，无一时不深其祇敬”，“大法小廉，万民乐乐”，“诘奸除暴，惩贪黜邪，以端风俗，以肃官方”，“勿为奸诈谄媚之徒所欺，勿信邪恶之言，为人君者修德，国家自得安康太平”等。这样的国家正是18世纪启蒙作家所盼望的理想王国。与此相对照，女皇统治下的俄国现实就太令人失望了：“人人尔虞我诈，神父尽量欺骗老百姓，仆人欺骗老爷，

①背景如下：1867年，女皇声称要修改17世纪编的法典，给全国公民以平等、自由和法律。她召集成立了“新法典编撰委员会”，但这个委员会尚未真正开始工作，就因涉及一些实质性的问题而被解散。因此，文中的这段话：“假如你的主意还未打定，而且意志也不够坚强，那你就可知，不但你不要改革政府，恐怕连改革你自己都很困难。”其针对性很强。

②转引自宋昌中：《诺维科夫与程颢和雍正的两篇俄文译文》，载《国外文学》，1985年第1期。

而大贵族总想欺骗皇上……拿吧，捞吧，不管什么，抓到手就算数。”这些文字大大刺激了叶卡捷林娜二世，《空谈家》也只能以停刊告终。心犹不甘的女皇居然自己写了一篇以教子有方的中国皇帝为主人公的作品《费维王子的故事》（1783年）以自诩，并有御用文人在一篇诗体书信中吹捧她是“坐在北国的宝座上的孔夫子”。

中国的孔夫子，在当时的俄国是圣人兼哲人。不少作家对孔子也颇感兴趣。1779年，作家冯维辛根据法文翻译了儒家经典《大学》，译文刊载在《学术新闻》杂志上。前文提到的程颐与其兄一起将《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改编后独立成篇。朱熹再作加工，分成“经”“传”两部，并认为“经”是由曾参记录下来的孔子的述作。因此，冯维辛的翻译可以说是将孔子的思想首次译介到了俄国。^①冯维辛选中《大学》进行介绍，非随意而为。《大学》着重阐述的是道德修养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强调当权者要“治国”“平天下”，首先要“明德”“修身”；同时也不能贪财，因为“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对于这一切，作为俄国启蒙运动的领袖的冯维辛是颇为赞赏的。他写于稍后的文章《论国家大法之必要》是18世纪俄国最有代表性的政论文，其中所表达的基本思想是与之相通的。他所译的《大学》在正式出版时曾遭检查机关删削。

俄国启蒙作家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对理想王国的追求，使他们将遥远的、更多是想象中的中国看成了一方净土。他们的这种思想情绪无疑受到过法国启蒙作家伏尔泰和狄德罗等人的影响，这些法国作家的文章和作品在当时的俄国是广受欢迎的，如赫拉斯可夫就编译过三卷本的《〈百科全书〉选集》。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中有这样的话：“假如世界上有一个政体，或者曾经有过这么样的一个政体，是值得哲学家们注意，同时又值得大臣们去了解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遥远的中国……”伏

^①在18世纪的俄国，学界有时将儒家经典都视为孔子的述作，如《中庸》一般认为是战国时子思所作，可是1788年列昂季耶夫译出这部作品时，在译名后加以说明“摘自中国哲人孔子的传说”。

尔泰在《路易十四时代》中写道：“由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它在伦理道德和治国理政方面堪称首屈一指。”他还在《礼俗论》中称赞中国皇帝“遵守帝国的法律行事”，而中国的法律充满“仁爱”，中国人“是所有的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中国是世界上最公正仁爱的民族。伏尔泰对孔子极有好感，他在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找到了启蒙作家所向往的道德治国、哲人治国的政治理想。18世纪的俄国作家与伏尔泰等一样，为东方文明古国的文化所感染，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与孔子、与儒家学说密不可分的。

在18世纪俄国作家的心目中，中国又是一个靠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蕴创造出辉煌艺术天地的国度。在康捷米尔、拉季谢夫和杰尔查文等作家的笔下一再出现过“奇异的中国智慧”这样的字眼。

这种印象的出现与当时的俄国沙皇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有关。18世纪初期，彼得大帝多次派人出使北京，搜集了不少中国的艺术珍品，并积极从西欧引进东方学和汉语人才。彼得大帝的女儿伊丽莎白女皇更加热衷于中国文化，在她执政的二十年间俄国的商队不断从中国采购诸如家具、餐具、瓷器、丝绸、茶叶等物品，而后穿越整个西伯利亚来到彼得堡。这时期出现在俄国的甚至包括石狮、灯笼、屏风、玉雕、漆器、刺绣、扇子和景泰蓝等这一些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工艺品。叶卡捷林娜二世主政的三十年（1760—1790），中国的园林艺术风行，以小桥流水和亭台楼阁为特征的“中国花园”“中国宫”“中国桥”等出现在不少俄国宫殿中。

在这样的氛围中，不少俄国作家也在他们的作品中留下相关的篇章。罗蒙诺索夫曾这样描述中国瓷器：聪明的中国人从泥土中造出器皿，而不需要用玻璃，“多少座小山 / 都变成了各色的瓷器， / 它们的美丽 / 吸引了多少人们， / 不顾狂风巨浪， / 跨越重重海洋！”作为特殊的装饰品，“它使得花园和走廊 / 充满了光亮， / 它使得室内一切 / 都变得如此妩媚。”罗蒙诺索夫认为瓷器与玻璃相似，是可以“给眼睛以享受”的一种艺术品。杰尔查文在诗篇《废墟》（1797年）中这样描写皇村中的中国式建筑：“这

儿曾经有过剧院，/ 那儿曾经有过秋千，/ 这里小屋里充满亚细亚式的安乐温暖。”“在祭礼之坛上，/ 文艺女神曾引吭高歌，/ 在奇花宝树之间，/ 珍禽异兽曾经遨游。”^①杰尔查文诗中提到的“剧院”是一座屋檐四角高高翘起的高大的建筑，那里上演的第一部剧目就是歌剧《中国菩萨》。这就是杰尔查文所说的“文艺女神曾引吭高歌”。

纵观 18 世纪俄国作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它带有那一时代欧洲看待东方的共同特征：“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着罗曼司、异国情调、美丽的风景、难忘的回忆、非凡的经历”^②。或者说，西方人往往“需要通过‘他性’，来创造一个‘非我’来发泄不满和寄托希望。富于创见的作家和思想家总是要探寻存在于自己已知领域之外的异域，长期以来，中国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他者’而出现的”^③。但是，由于俄国的社会环境和民族气质与西欧有很大的差异，18 世纪的俄国作家对待中国文化更具实际性，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借这个不甚清晰的“他者”来反观俄国自身存在的迫切的社会问题，在这种印象里漂浮着的其实更多的是自己的映像。

二 俄国早期汉学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译介

在中俄文学交往中始终活跃着一个群体的身影，那就是俄国的汉学家。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人在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俄罗斯民众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他们是东学西渐中的重要一环，是当之无愧的文化使者。

由于地理位置的接近，中俄两国早就相互关注。明朝末年，明神宗

① B.W.MAGGS:《十八世纪俄国文学中的中国》(李约翰译)，台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 年版，第 219—221 页。

②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年版，第 1—2 页。

③ 乐黛云：《世界文化总体对话中的中国形象》，载《文化类同与文化利用》，史景迁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年版，第 8 页。

曾写信给俄国沙皇瓦西里·苏伊斯基，表示互相交流的愿望，时间是1619年。^①同样，从16世纪、17世纪开始，俄国政府出于政治和经济的需要，也陆续向中国派出外交使团和传教士团，俄国早期汉学家的出现与此有关。

1567年，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派雅雷舍夫出使中国。在17世纪末《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前，俄国官方在1618年、1654年、1675年、1686年先后派出四个外交使团来华，率队的分别是佩特林、佩可夫、斯帕法里和维纽科夫。这些使团大都写有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其中有的报告和旅行记成了俄国最早研究中国天文、地理、交通和习俗的重要文献。如佩特林所著的《中国、腊宛及其他定居和游牧国家、乌卢斯诸国、大鄂毕河、河流和道路一览》，斯帕法里所著的《经过西伯利亚的旅行》《旅途日记》《1675—1678斯帕法里访华使团文案实录》。18世纪，彼得大帝进一步加强了与中国的联系。1715年至1736年，他曾六次派郎格作为特使来华。1724年他在建立俄国科学和艺术院（俄皇家科学院前身）时，注意从西欧引进东方学和汉学人才，曾编撰了欧洲第一部《汉语词典》的德国学者拜耶尔被聘为科学院院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做出向中国派出东正教教士团的决定。其原意无疑是想扩展俄在华的政治和宗教上的势力，不过这一决定后来在客观上推动了中俄文化交流。

1715年春天，俄国官方派出以修士大司祭伊拉里翁·列扎依斯基为首的第一个东正教教士团来到北京。此后，几乎每隔十年就向中国派遣一批东正教教士。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先后有二十个教士团来到北京。在

①此信的缘起与后文提到的俄国第一个派往中国的由佩特林率队的官方使团有关。写信的时间有两种说法，一为1618年，一为1619年。该信中称：“在此世上，尔为大国君主，朕亦为大国皇帝也。愿两国之间道路畅通无阻，尔等可常相往来。尔若进贡珍品，朕亦以优质绸缎赏赐尔等。……因路途遥远，且语言不通，朕不便遣使访问贵大君主，现谨向贵大君主致意。一旦朕之使者有路可去尔大君主处，朕将遣使前往。基于吾人之礼教，朕不能亲自出访他国，且目前亦不能派遣使臣及商人出国。”因当时俄国无人识中文，此信被搁置了半个多世纪，直到1675年斯帕法里率团访华途径托博斯克时才找到译者，解读后寄往俄宫廷。